

沪去年查处违法广告案5448件

罚没款1.32亿元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上海市工商局公布《2017年度上海广告市场状况报告》(白皮书)。2017年,上海工商(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各类违法广告案件5448件,处罚没款1.32亿元,同比分别上升94.4%、54.4%。

根据市工商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市主要媒体广告年度监测(条次)违法率降至0.2%,再创历史最低,并已连续第十年保持在0.4%以下的低位。国家广告监管平台监测数据显示,广告条数违法率、广告条次违法率、广告时长违法率三项指标,上海地区均为全国最低。

全市广告信用评价报告显示,96个大众传播媒介广告信用评价均值96.13分,已连续四年持续向好。32个行业广告信用评价均值89.68分,同比提高0.98分。上海广告市场秩序继续趋好,有力筑建了一个法治化、公平化的广告营商环境。

统计显示,截至 2017 年底,上海共有广告经营单位 26.8 万户,同比增加 6.02 万户,增幅 29%。其中外商投资广告企业 2078 户,同比增长 86.7%。全市广告营业收入为 1760.31 亿元(其中应税经营额 564.45 亿元,同口径下占全国总量的 8.2%),广告业增加值 253.9 亿元,约占全市生产总值(GDP)的 0.8%,占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1.22%。报告反映,“放、管、服”改革有力激发了市场活力,事中事后监管制度运行有力,上海广告市场秩序持续稳定可控。

据介绍,商事制度改革以来,近五年

新设立广告企业数占到广告企业总数的81.67%。2016年2月国务院发文大幅取消外资准入等广告行政审批后,近两年新设立广告企业数占到广告企业总数的57.73%。市场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本市广告企业分布仍保持内资在城郊区域居多,外资集中于浦东自贸区的总体格局。郊区内资广告企业注册量占全市内资广告企业的83%,自贸区外资广告企业数量占全市外资广告企业数的29%。全市广告企业注册数量最多的为奉贤区,增幅最高的为崇明区。广告营收静安继续领跑全市,崇明跃居第三,互联网全面超过传统媒体。

全市广告营收前三位依次是静安、嘉定和崇明区，其中嘉定和崇明区的营收增幅均达 25%。普陀区继上年增长 43%后，继续增长 76%，增幅全市第一。

2017 年全市互联网媒介经营单位广告营业收入 139.74 亿元,同比增长 85.25%。主营内、外资广告企业营收媒介排名中,互联网广告全面超过传统媒体广告,均列第一;电视、户外媒介交叉列第二、三位。在电视、广播、报纸、期刊、互联网五类媒体中,互联网广告营收占比逐年攀升,已由 2011 年的 10.6% 升至 67.1%。

2017年,本市首次对1437户主营广告企业开展了广告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情况的“双随机”抽查,并同期向被抽查的企业开展了广告经营情况统计,数据显示,随机抽查企业的平均广告从业人数为2.14人,平均广告营收为115.17万元,平均广告业务成本为79.81万元,平均广告业务利润为18.11万元,平均工资福利费为37.61万元。广告经营单位整体平均利润率仅6.1%。

上海法院召开解决执行难再动员再部署会

刘晓云：破解执行难工作不能松懈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高远

本报讯 4月18日，上海法院决胜“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再动员再部署会召开。上海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刘晓云出席会议并讲话。

刘晓云指出，自2016年上海被确定为“两年基本解决执行难”重点推进地区之一以来，全市法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院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经过不懈努力，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执行工作中还有许多短板和不足，破解执行难工作决不能松懈。

刘晓云强调，全市法院执行工作要“固成

果、补短板、保决胜、谋长远”，巩固破解执行难已经取得的成果，认真查找执行工作中的问题，补齐短板，确保决胜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并不断完善执行长效工作机制，实现执行工作良性循环，让执行难问题成为历史。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各院“一把手”责任，加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组织领导；二要紧盯目标不放松，继续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巩固破解执行难工作成效；三要严格办案标准和流程，大力推进执行规范化、信息化建设；四要进一步健全执行权力运行机制，形成执行工作长效机制；五要持续推进执行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一流、作风一流、廉洁奉公的执行队伍。

讲好“党的诞生地”故事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讲好“党的诞生地”故事,第五届大艺展组委会日前组织来自北京大学的师生代表41人先后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图为北京大学合唱团的师生们一早来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
记者 王湧 摄



“中国芯”不能受制于人 民族工业无芯不立

强起来离不开自主创“芯”

如《纽约时报》所说，美国的真正考量是要遏制中国制造业升级，拖慢“中国制造2025”这一强国战略。这些年来，中国通信产业发展迅速，芯片自给率不断提升。华为的麒麟芯片不断追赶世界先进水平，龙芯可以和北斗一起飞上太空，而蓝牙耳机、机顶盒等日用品也在大量使用国产芯片。但也要看到，在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更高的一些领域，国产芯片还有较大差距。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此次事件，让我们感受到切肤之痛。

面对技术壁垒,不能盲目悲观,特别不能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丧失信心。应该激发生理性自信的心态,通过自力更生真正掌握核心技术。如果能够痛定思痛,加快推进互联网和信息产业政策完善及科技体制改革,并产生更强的改革紧迫感、凝聚起更大的改革力量,那就有可能把挑战变成机遇。

对互联网和信息产业来说,商业模式的创新固然能够带来流量和财富,但最终比拼的还是核心技术实力;对政府部门而言,应该形成更加有利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环境,比如说芯片设计具有试错成本高和排错难度大的特点,就需要从更大层面整合科研力量、实现集中攻关。就像中兴对员工们所说,“任何通往光明未来的道路都不是笔直的”,突破核心技术肯定会带来阵痛。我们不必为今天的封锁惊慌失措,中国的高科技能够克服初期从无到有的困难,也有信心在后期突破核心技术的瓶颈。

保持信心的同时，也不能因遭遇制裁而产生极端偏激的情绪。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有足够的腾挪空间；另一方面，国产通信产业从蹒跚起步，如今发展到与世界通信巨头并驾齐驱，并在5G时代展现出领跑能力，绝不是得益于自我封闭。我们并不需要把封锁当作“重大利好”来激励“自主研发春天来了”，更不能把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面对高科技的技术攻关，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今后7年内，将禁止该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这一事件在舆论场上引发深入讨论，出口禁运触碰到了中国通信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的痛点。“缺芯少魂”的问题，再次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

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

此次中兴遭制裁，所涉产业链涵盖了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础软件，正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排名首位的“核高基”专项攻关领域。回过头来看，当年“核高基”的立项多有先见之明。

梳理近 20 年中国科技发展,可清晰辨识出一道技术链前移、上移的轨迹——在几乎所有国民经济产业门类中,我们的技术水平、产品档次已经基本上从低端迈向中高端,国际竞争态势从总体跟跑到总体并行甚至个别领跑。但在某些产业链顶端,我们与先进水平的差距仍很明显,我们受制于人、被“卡脖子”的环节,从金字塔中下层上移到了塔顶。

这些“卡脖子”技术瓶颈，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集中于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诸如军工、航空航天、“核高基”之类的硬约束，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核心技术。第二类软性约束主要聚焦于经济性和便利性，即花钱可以买来核心技术、关键装备，但直到具备自主能力之前，必须忍受畸高的价格、拖沓的工期和身不由己的附加条款；而一旦能够自主装备了，同样的东西，对我们的报价当天就三成五成地往下降，类似的案

例数不胜数。

必须清醒认识到，在金字塔基“中国制造”到塔顶“中国创造”的路上，我们当下亟待补足塔身“中国智造”一环，属我们现实的最短板。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看，顶尖制造是由顶级设计和系统集成外加精密制造能力构成，也就是说，拥有顶级设计和集成能力的人才是老板，他们基于原始创新专利、标准和品牌，攫取最大“一桶金”，而全球“老板俱乐部”会员以美、日、德等国为主。中间制造（智造）环节，即元器件加工、关键设备配套，基本由全球最负盛名的制造商提供，主要集中在日、美、德、瑞士等地。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个场合都曾强调过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他还多次提到要掌握核心技术,并指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而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力更生。这些话在今天看来,非常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都说真正的自主创新是被逼出来的。近20年来,被“卡脖子”的气息从未如此之近,我们是仍靠讹诈要来核心技术,还是要掉幻想认清现实,自己当自己的老板。答案不言自明。

民族工业 无芯不立

中国一年进口芯片 2000 多亿美元,比进口石油都多。更多数据直观揭示了这种差距有多大,在集成电路中,PC、服务器的 CPU 芯片以及手机等移动终端中需求量最大的存储芯片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仅移动通信领域的海思、展讯能够比肩高通、联发科的国际水准,但占据的市场份额并不高。而如果把视线从集成电路行业移开,就能发现来掌握核心技术的名单还要长得多。

自由貿易的可貴之處，就在於遵從市場法則，市場處於平衡狀態。但中興如今的境遇告訴我們，在一個不講規則，喜歡用事頭說話的貿易強權下，平衡是很容易被打破的。一些國家可能篡改貿易規則，可能背棄承諾，一些企業可能濫用市場地位。

在中兴的遭遇带给中国终端行业一股寒意之中,中国集成电路行业需要承担起历史责任。在这一方面,不乏成功的先例,比如华为的海思芯片,就打破了高通、三星对高端手机芯片的垄断,华为的这颗“中国芯”支撑了自己的手机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信心。还有京东方的液晶面板,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消费者能享受到这么便宜的液晶电视,很大程度上要拜国产液晶厂商的异军突起所赐。

而相比于别的行业，集成电路又是一个资本壁垒和技术壁垒非常高的行业，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材料到集成电路到高端加工设备制造的整体突破，这个过程可能相当漫长，需要耐得住寂寞，需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需要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帮助扶持，更需要一批孜孜以求的企业家。华为不惜血本地投入研发，才有所成就，京东方曾经多年亏损，但矢志不渝，他们身上都有一股以产业报国的雄心壮志。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中国对核心技术的战略意识，中国企业的这种潜力，让美方感受到了压力，才把打击的目标瞄准了中国高科技企业。产业竞争最终要靠实力说话，中国政府和企业界应该及早做好准备。

(未完 整理)